



上图：梁庄。

和现状的描写中，有某种问题性，但是我觉得这问题该如何解决，需要更多学者的解读，我不想过分的问题化。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现在也是很多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必读书目，我想他们也是从真实的场景里面找到他们所要的研究和思考的材料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虽然都是一个村庄的，但是你去采访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发现一些跟你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家庭？

梁鸿：那肯定会有。就算是自己的亲戚朋友，你真的了解他们吗？乡村农民的很多境遇、现状真的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像我的亲哥哥早年外出打工，他给我讲他的故事，讲他怎么逃跑，怎么被抓到收容站，这事以前我都不知道，因为这次写书的契机我才了解这段往事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你去挖

掘，值得你去倾听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近些年，梁庄的变化大吗？

梁鸿：说大也不大，房屋还是那些房屋，只是原来的小学废弃了，孩子们都到镇上去上学了。原来村庄里的水塘给填满了，要么盖了房子，要么成了垃圾场。有些人出生，有些人死去。从一个历史长河来看，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里的很多人都去世了，包括我的父亲，那你说算没有任何变化吗？从微观的角度来看，有很大的变化，所以我今年要回家写一本《梁庄十年》，因为《中国在梁庄》已经出版十年了，我想每十年来写一本，也算是一个长远的记录，直到我去世，这可以说是关于村庄的一个连续性的文本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中国在梁庄》成功以后才写的《出梁庄记》，还

是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写出城农民？

梁鸿：我在采访写作《中国在梁庄》的时候，自然而然的，他们就谈到了他们的孩子在外面打工，他们不在场，又是在场的。我那时就想，我应该把那些在外打工的人，他们的故事也讲出来，这才是完整的梁庄。我之前并没有规划好要写什么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出梁庄记》因为记录的是进城的农民，采访的过程中是不是遇到更多的困难？

梁鸿：确实是的，因为要到一个地方去找人，本身就比较艰难。他们又不在中关村或者上海徐家汇，都在比较偏远之地，找人是比较费劲的事。说农民到城市打工，可是到底他们去了哪里呢？他们住在哪里呢？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。所以我在《出梁庄记》中仔细写了我是